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五辑·第九卷)

〔现〕梅贻琦

(1889年~1962年)

高等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学苑音像出版社

G40
246

教师必读文库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第五辑·第九卷)

[现]梅贻琦

(1889年~1962年)

高等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
学苑音像出版社 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五辑/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主编. —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6. 5

ISBN 7-80135-741-8

I. 中... II. 北... III. 教育名著-作品综合集-中国文学 IV. I 2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31430 号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第五辑

[现]梅贻琦高等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

北京师联教育科学研究所 编 选

总主编 冯克诚

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出版发行
学苑音像出版社

★

北京密云红光印刷厂印刷

2006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1/32 印张:195 字数:5066千字

ISBN 7-80135-741-8

全二十册定价:526.00元(册均26.30元)

(ADD:北京市朝阳区三间房邮局10号信箱)

P. C. : 100024 Tel: 010-65477339 010-65740218(带Fax)

E-mail: webmaster@BTE-book.com Http://www.BTE-book.com

教师必读文库

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出版说明

教师职业化、专业化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共同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教师职业素质素养达到基本要求和提高,是当前教育改革和课程改革的急迫要求。为此,我们组织相关专家重新系统地、较完整地遴选、编译、评注了这套适合中小学教师职业阅读的《中外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其编选原则和方针是:

1. 从古至今,各时代、各地区和国家有代表性,和对当代及后世教育发生直接影响的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品、经典论述。教育家的教育实践风范和教育思想对当代和后世的影响远大于制度影响,同时,对现实教师的成长也有借鉴和参考作用。作为职业教师,总听说、总涉及但在学校图书馆里总缺乏的那些著作是我们这次系统编选的重点。

2. 全套分中国卷 100 种、外国卷 100 种,每二十种为一辑,共十辑,约 200 种,同时出齐。每种含教育家的生平、教育事迹、教育成就、教育思想评析和经典教育论著选读及注解解读导读两部分。这对于全面深刻和原原本本地了解学习、运用教育家的思想和著作是十分有益的。

编者

2006 年 4 月

目 录



中国教育名家名作精读丛书 第五辑·第九卷

[现]梅贻琦高等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

上 篇

梅贻琦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

梅贻琦简介	(1)
梅贻琦教育思想(一)	(3)
(一)大学之道——源流	(5)
(二)“通才教育”——核心	(6)
(三)学术自由——原则	(12)
(四)个人修养——“修己”工夫	(14)
梅贻琦教育思想(二)	(17)
(一)毕生贡献近代教育,鞠躬尽瘁于水木清华	(17)
(二)弘扬中华文化精粹,融合西学人文主义教育理念,阐发 现代大学之精神	(30)
蔡元培和梅贻琦的大学教师观	(35)
(一)大学理想与教师地位	(36)
(二)“兼容并包”与教师聘用	(40)
梅贻琦与清华	(45)
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	(49)
(一)梅贻琦如是说	(49)
(二)潘光旦如是说	(51)
(三)冯友兰如是说	(53)

下 篇

梅贻琦教育文论选读

清华发展计划	(61)
赠别大一诸君	(63)
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	(65)
体育之目标——在清华暑期体校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69)
就职演说	(70)
关于毕业生的职业指导等问题	(74)
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	(75)
大学的意义及学校之方针——欢迎新同学的几句话	(77)
教授的责任——在廿一年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80)
在“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83)
论“拖尸”	(85)
关于校际体育比赛	(86)
时局与健康等问题	(87)
关于学生参加救护伤兵事	(89)
《清华同学录》序	(90)
在 1933 年度秋季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91)
巡视考场时对记者的谈话	(95)
关于举办特种研究的呈文	(96)
形势与秩序问题——在二十三年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	(98)
关于中英学术交流	(100)
体育之重要	(101)
提倡吃苦耐劳精神(节录)(上略)	(102)
在建校 24 周年纪念典礼上的讲话	(103)

回顾与前瞻——在建校二十六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	(106)
抗战期中之清华	(110)
抗战期中之清华(续)	(116)
抗战期中之清华(二续)	(120)
大学一解	(126)
抗战期中之清华(三续)	(140)
抗战期中之清华(四续)	(146)
抗战期中之清华(五续)(1945年4月)	(156)
时局与教育	(164)
对战后清华发展之理想	(165)
复员期中之清华	(166)
闻闻一多被害后的日记	(170)
复员后之清华	(171)
复员后之清华(续)	(177)
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	(219)

梅贻琦简介

梅贻琦(1889—1962),我国现代著名教育家。曾长期在清华大学执教、任职,对解放前清华大学的建设和发展都做出了重要贡献。1955年赴新竹创办“清华原子科学研究所”,后发展为今天的新竹清华大学。

梅贻琦早年留学美国,为我国首批庚款留学生之一。1914年毕业于回国,翌年即到清华大学任教。先后讲授数学、英文、物理等课,由教员而讲师而教授。1926年4月,他作为物理系的首席教授被教授会公推为教务长,从此开始展现他的治理学校的才能。他着手对新建的大学部做了必要的改组和调整,使它真正成为一所正规而有特点的大学雏形。他先后发表了《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赠别大一诸君》等文章,初步阐明了他的教育主张。

1928年清华学校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梅贻琦被派赴美国担任“清华学生留美监督”。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久,在国难当头、民族危亡之际,梅贻琦应召回国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直到1948年12月离校,连任校长长达十七年之久,包括西南联大期间以清华大学校长身分兼任“联大”常委会主席。十七年中他呕心沥血、惨淡经营,多所建树。

1931年到1937年的清华大学,在梅的主持下,在教学、科研、学风等方面均有很大进步。他十分重视教师的主导作用,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点,努力充实师资队伍;筹建了著名的清华工学院,创办了农业、航空等特种研究所,开办特种研究事业;广泛开展与国外学术界的联系与交流;扩充出版学术刊物,促进学术研究。通过切实努力,把清华大学办成了国内外有影响的学校。

1937年到1945年,梅贻琦坚持在西南联大主持校务。八年抗战期间,他进一步发挥了他的治校才能。在政治、经济、物质生活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团结具有不同历史、不同校风的三校师生,作出了很大成绩,为国家保存并培养出一大批人才。他在1941年说过,“在这风雨飘摇之秋,清华正好像一个船,飘流在惊涛骇浪之中,有人正赶上驾驶它的责任,此人必不应退却,必不应畏缩,只有鼓起勇气,坚忍前进,虽然此时使人有长夜漫漫之感,但吾们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风定,到那时,我们把这船好好开回清华园。到那时他才能向清华的同人校友敢告无罪。”此间他发表了《致全体校友书》、《大学一解》等重要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的教育思想。

抗战胜利后,他为清华复校奔走,并先后发表了《复员中之清华》、《复员后之清华》、《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等文,详细阐述了他对战后教育事业的设想。

政治上,梅贻琦是一位真诚的爱国者。在他长校的十七年中,曾爆发了著名的“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和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二一”学生爱国运动,他本着既不得罪国民党当局,又力求不使学生受到无辜残害的原则从中斡旋。抗日战争期间,梅贻琦加入国民党,此后与国民党当局关系一步步接近,常被邀为蒋介石的座上客,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委员。由于历史给他的局限,他不能理解中国社会伟大的历史变革,导致他1948年底北京解放前夕离校,只身飞往南京。

梅贻琦有着治理清华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的丰富的教育实践。虽然他没留下很多的理论著作,但在现已收集到的文章、讲话、文稿中,含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值得深入研究。诸如:

关于大学应成为教育中心和科学研究中心的思想。他主张,“办学校,特别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研究学术,二造就人才。”

关于教师在教育中的主导地位与主导作用的思想。他认为:“师资为大学第一要素”,提出“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的著名论点。

关于注意学术研究向高深专精方面发展,努力推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思想。

关于重视体育,“发展全人格”的思想。

关于建立“根据事实推求真理”,“俭朴好学”,“毫无纨绔习气”的优良学风的思想。

关于注意从国家实际需要出发,发展应用科学的思想,以及其他关于治理学校的思想和主张,等等。

梅贻琦教育思想(一)

梅贻琦,字月涵,1889年生于天津。1909年投考第一批庚款。留美生被录取,在美读电机工程。回国后历任清华学校教员、物理系教授、教务长、留美学生监督等职。1931年被任命为清华校长。梅贻琦是1931年12月初到校任职的。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为止,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即使清华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综述如下:

梅贻琦于1931年12月3日到职视事。到校当天,即在全校大会上发表就职演说宣布施政方针。略有如下几条:

①办大学的目的。“办学校,特别是办大学,应有两种目的: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清华的经济和环境,很可以实现这两种目的,所以要向这方面努力。”

②大学者,有大师之谓也。“一个大学之所以为大学,全在于有没有好教授。孟子说‘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我现在可以仿照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们的知识,固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亦全赖有教授的 inspiration。”

③既要造就人才,更要(合理)利用人才,避免人才浪费。“……

就拿清华说罢,清华的旧同学,其中有很多人才,而且还有不少杰出的人才,但是回国之后,很少能够适当利用的,多半是用非所学,甚且有学而不用。……我们今后对本校的毕业生,应该在这方面多加注意。”

④保持良好校风。“清华向来有一种简朴好学的风气,这种良好的校风,我希望今后仍然保持。”

⑤合理使用经费。“清华的经济,在国内总算是特别的好,特别幸运。但如果和国外相比,还相差甚远。”“我们对于经济问题,有两个方针,就是基金的增加和保存。我们总希望清华的基金能够日渐增多,并且十分安全,不至动摇清华的前途。然而我们对于目前的必需也不能因为求基金的增加而忽视,应当用的,我们也还得要用。不过用的时候总要求力节罢了。”

⑥时刻不忘救国的责任。“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对于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策,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的处在,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紧记住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各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之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这六条施政方针,在当时中国大学教育尚属摸索阶段,办学思想与方针尚未完全定型之际,对清华后来的发展,具有奠基作用。更可贵的是,梅贻琦对于这些基本思想终生奉行不渝,而且随着实践的不断发展而不断加以充实、完善。使他和他的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一起,在短短的五六年间,在清华创造了一个“黄金时代”。而他的教育思想也渐趋大成。

关于梅贻琦在长校最初几年所取得的成就,笔者在其他撰作中,曾屡述梗概。而对清华发展最具决定意义的,是他的一整套教育思

想。这套完整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是“清华文化”的思想基础和理论基础。

(一) 大学之道——源流

梅贻琦的教育思想首先来源于他的多年办学的实践经验。此外还有三个理论来源,即①中国古代儒家大学(Great Learning)教育思想和古希腊教育哲学思想;②欧美近代民主与法治思想;③以蔡元培为代表的(实际上也是中国先秦时期的百家争鸣和欧美近世高等学府所倡导的)兼容并包和学术自由思想。梅贻琦认为,中、西大学教育思想源流,用比较的方法探讨之,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他说:

今日中国之大学教育,溯其源流,实自西洋移植而来,顾制度为一事,而精神又为一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不见有形式相似之组织,就精神言,则文明人类之经验大致相同,而事有可通者。

梅贻琦认为:古今中外,一切教育(包括大学教育),均须从“修己”开始。作为哲学思想,在西方可溯源于古希腊人生哲学的“一己之修明”(Know thyself),在我国,则可溯源于儒家创始人孔子的“古之学者为己”和儒家代表作之一的《大学》“八目”中的前“五目”(格、致、诚、正、修)。但儒家的“为己”,与西方的“一己之修明”又有所不同。前者所说的“为己”、“正心、修身、诚意”、反对“舍己以从人”等,非指大学教育的目的,而仅是指根据自己的特点(或曰“性之所近”)发展自己的第一步。所以它同时又主张“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等,亦即《大学》“八目”中的后“三目”：“齐家、治国、平天下。”

据此,他认为大学教育的根本使命,无论古今中外,应该是一致的。他引用古代儒家名著《大学》中的一段话并加以发挥说:

《大学》一书开章明义之数语即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若论其目,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属明

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属新民。《学记》曰，“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二语，可以为明明德之注脚，化民成俗，近悦远怀三语可以为新民之注脚。孟子于《尽心章》，亦言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亦不出明明德之范围，而其泛论群居生活之重要，群居生活之不能不有规律，亦无非阐发新民二字之真谛而已。

总之，儒家思想之包罗虽广，其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之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二大步骤，则始终如一也。

(二)“通才教育”——核心

“通才教育”思想，是梅贻琦教育思想的核心。正是奉行这种思想，使他在30年代短短数年内，培养出各个领域中真正称得上是卓越的、第一流的人才，创出了清华校史上的“黄金时代”，而到了抗战时期的《大学一解》之作，使这一思想得到理论上的概括，趋于大成。

“通才教育”(General Education)也称“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近代西方大学所普遍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思想体系。简要说来，这种思想主张“一个大学生，不仅应有专门的知识，尤须接受普通教育，此普通教育并非专门知识的准备，而应渗透在整个大学课程中”。普通教育的目标则是：“在共同的文化中培养具有共通理想的公民。”大学四年的课程，“至少要有三分之一的分量是属于普通教育的，每个学生对于人文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三种，都应融会贯通”。

梅贻琦的“通才教育”思想是一贯的，执行起来也是十分认真的。早在1927年，他在《清华学校的教育方针》一文中，就提出：“盖今日之社会上所需要之工程人材，不贵乎专技之长，而以普通基本的工程训练为最有用。”不过他那时还只是从“时需”出发，而且仅指工

程学科而言。到了1932年夏,他的这种思想就具有明显的理论色彩了。这年6月,他在一次全校性集会上讲话说:

这三个月里诸位听了多次的讲演,对于各学科要点,当已得到不少的了解。本校举办这些系的目的,固然是希望学生获得一技一艺之专长,以期立身致用于社会。同时盼大家在注意本系主要课程之外,并于其他学科也要有相当认识。有人认为学文学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以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以梅贻琦为代表的清华大学校、系领导以至全体教授一直认为,大学的首要任务不在授予学生以专门技术知识或职业训练,而在传授学生一些普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方面最广泛的综合的基本知识,以培养一批具有政治头脑与治世才干、多方面书本知识与文化教养的高级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大学不应培养只有专门技术的“高等匠人”,而应是“周见洽闻”的“完人”。大学教育不应成为职业或技能教育与专家教育,而要给学生以“士”的教育,以培养“读书知礼”的“士人”或曰“精神领袖”。

而到了抗战时期他写《大学一解》,才把“通才教育”思想发挥到真正的理论高度。这篇代表作通篇所论证的,就是“通识为本,专识为末”、“通重于专”这个主题。他在结语里说:“不尽者尽之,不力者力之,是今日大学之要图也。”这里的所谓“要图”,指的就是培养“通才”的理想和目标;所谓“不尽”、“不力”,说的就是为实现这一目标扫清障碍。

在《大学一解》里,他曾分数层纵论通与专的关系:

1. 新民与扰民

大学新民之效,厥有二端。一为大学生新民工作之准备;二为大

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之风气。于此二端,今日之大学教育体认亦有未尽,而实践亦有不力也。试分论之。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此种实际之责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情理乎?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而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动辄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毕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略救近时过于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因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即寄寓于事业。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自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轻,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子?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2. 出身与资格

总之,从“通才教育”的观点看来,在全部教育过程中,大学阶段的目的充其量只是取得一种完成“新民”使命的“出身”或“资格”,即如他在《大学一解》中所阐述的:“普通大学教育所真能造就者,不过一出身而已,一资格而已。”他接着写道:

出身诚是也,资格亦诚是也。我辈从事大学教育者,诚能执通才之一原则,而曰,才不通则身不得出,社会亦诚能执同一之原则,而曰,无通识之准备者,不能取得参加社会事业之资格,则所谓出身与资格者,固未尝不为绝有意识之名词也。大学八目,明德之一部分至身修而止,学府之机构,自身亦正复有其新民之功用,就其所在地言之,大学伊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其声教所暨者言之,则充其极可以为国家文化之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之汇点(近人有译英文 FOCUS 一字为汇点者,兹从之)。即就西洋大学发展之初期而论,十四世纪末年与十五世纪初年,欧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运动焉,而此三大运动者均自大学发之。一为东西两教皇之争,其终于平息而教权复归于一者,法之巴黎大学领导之功也;二为魏克立夫(Wy Clif)之宗教思想革新运动,孕育而拥护之者英之牛津大学也;三为郝斯(John Hus)之宗教改革运动,郝氏与惠氏之运动均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声,而孕育与拥护之者,布希米亚(战前为捷克地)之蒲拉赫(Prague)大学也。大学机构自身正复有其新民之效,此殆最为彰明较著之若干例证。

间尝思之,大学机构之所以生新民之效者,盖又不出二途。一日为社会之倡导与表率,其在平时,表率之力为多,及处非常,则倡导之功为大。上文所举之例证,盖属于倡导一方面者也。二日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涵养与简练揣摩。而此二造者又各有其凭藉。表率之效之凭藉为师生之人格与其言行举止,此为最显而易见者。一地之有一大学,犹一校之有教师也,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学府为表率,古人谓一乡有一善士,则一乡化之,况学府者应为四方善士之一大总汇乎?设一校之师生率为文质彬彬之人,其出而与社会周旋也,路之人亦得指而目之曰,是某校教师也,是某校生徒也,而其所由指认之事物为语默进退之间所自然流露之一种风度,则始而为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教化云者,教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于学校环境以外,然则学校新民

之效，固不待学生出校而始见也明矣。新文化因素之孕育所凭藉者又为何物？师生之德行才智，图书实验。新民之一部分自身修而始，日出身者，亦日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从事于新民而已矣，夫亦岂易言哉？不论一人一身之修明之程度，不问其通识之有无多寡，而但以一纸文凭为出身之标识者，斯失之矣。

3. “通重于专，事业人才将焉出？”

大学不培养专门人才，上哪里去求建设人才呢？这是梅贻琦给自己提出的问题。他回答说：

曰，此未作通盘观察之论也。大学显重要，究不为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为大学应有之任务，而造就专才则固别有机构在。一日大学之研究院。学子既成通才，而于学问之一部门，有特殊之兴趣，与特高之推理能力，而将以研究为长期或终身事业者可以入研究院。二日高级之专门学校。艺术之天分特高，而审美之兴趣特厚者可入艺术学校，躯干刚劲，动作活泼，技术之智能强，而理论之兴趣较薄者可入技术学校。三日社会事业本身之训练。事业人才之造就，由于学识者半，由于经验者亦半，而经验之重要，且在学识之上，尤以社会方面之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者为甚，尤以在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今日大学所授之社会科学知识，或失之理论过多，不切实际，或失诸凭空虚构，不近人情，或失诸西洋之资料太多，不适国情民性；学子一旦毕业而参加事业，往往发见学用不相呼应，而不得不于所谓“经验之学校”冲，别谋所以自处之道，及其有成，而能对社会有所贡献，则泰半自经验之学校得来，而与所从毕业之大学不甚相干，以至于甚不相干。

4. 今日大学教育之一大通病

梅贻琦认为近世中国大学教育的一大通病是“通识授受之不足”。这就牵涉到大学本科生的“分系”问题。前文曾介绍了清华战前所采取的“大一不分系”的做法。在《大学一解》里，梅贻琦又进一